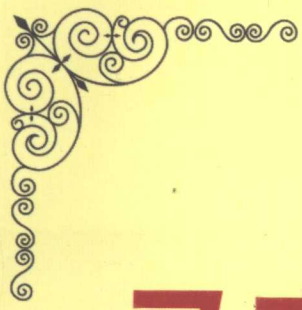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及其理论成果

MAKESIZHUYIZHONGGUOHUA
JIQILILUNCHENGGUO

主编 王国胜 杨志清 陈东海

西安地图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

主 编 王国胜 杨志清 陈东海
副主编 秦剑军 李 华 冯 魁 陈玲玲 宋慧敏
编 委 石国贞 王朝举 何璟莉 邢战国

西安地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 / 王国胜, 杨志清,
陈东海主编。-西安: 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80748-440-0

I. 马… II. ①王…②杨…③陈… III. 马克思主义—发
展—中国 IV. D61

中国版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9937 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

王国胜 杨志清 陈东海 主编

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友谊东路 334 号 邮政编码: 710054)

新华书店经销 黄委会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印刷厂印刷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开本 24.875 印张 637 千字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48-440-0

定价: 27.00 元

前言

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成为理论界、学术界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学术界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开始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关于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的渠道问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通过三条渠道传入中国，即日本、西欧和俄国。日本一度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有影响的一条渠道，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人都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日本被翻译得较多，为留日的中国学生接触并日益接受，日本的崛起也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希望从中找到救国救民的借鉴。西欧也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渠道。1917年到1920年期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他们身处西欧这一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亲身体验到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实际状况和工人阶级的贫困生活，也感受了十月革命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因而在思想上进步很快。他们先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等进步组织，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学说，探究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十月革命爆发后，继西欧和日本之后，俄国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最主要渠道。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俄国的建立，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提出者，有学者认为，十月革命后，李大钊虽然没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的词句和概念，但是他是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第一人，他主张用马克思的学说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而且积极提倡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有学者认为张闻天是我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他在1937年提出了“文化运动中国化”、“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主张。但学术界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毛泽东同志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的，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53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他号召全党要“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第70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0月）这一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都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的，是一个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前者为后者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后者是在继承前者基本原理基础上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们辩证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开拓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伟大的实践运动。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弄清马克思主义最初如何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理论成果以及基本经验，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教育，更加坚定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我们工作和学习的指导，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编写了此书。

本书由王国胜、杨志清、陈东海任主编，秦剑军、李华、冯魁、陈玲玲、宋慧敏任副主编，石国贞、王朝举、何璟莉、邢战国任编委。各章具体撰写情况如下：

郑州大学王朝举（第四章），何璟莉（第六章），石国贞（第七章），王国胜（第十七章）；河南农业大学秦剑军（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杨志清（第十二章、第十九章、第二十一章）；河南大学邢战国（第五章、第八章）；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李华（第十六章、第十八章）；周口师范学院陈东海（第九章、第二十章），宋慧敏（第十章）；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陈玲玲（第十一章、第十三章）；开封大学冯魁（第十四章、第十五章）。

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加上时间仓促，不足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指正。

编者

2009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探索	(1)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的历史追溯	(1)
第二节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探索	(5)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	(8)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内涵与基本经验	(11)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1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实质	(14)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	(18)
第三章 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	(20)
第一节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20)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体系	(30)
第三节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	(37)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	(39)
第一节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39)
第二节 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	(46)
第三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提出	(49)
第四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	(54)
第五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58)
第六节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61)
第七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69)
第五章 实事求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71)
第一节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丰富发展	(71)
第二节 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	(78)
第三节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 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81)
第六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87)
第一节 近代中国社会和民族民主革命	(87)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95)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108)
第七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119)
第一节 武装斗争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119)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	(132)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的建设	(141)
第八章 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152)

第一节	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思想	(152)
第二节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58)
第三节	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67)
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175)
第一节	从“走俄国人的路”到探索走自己的路	(175)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	(181)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构想	(186)
第四节	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188)
第十章	对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政策的探索	(197)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	(197)
第二节	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探索	(204)
第三节	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探索	(214)
第四节	社会主义国防建设和对外关系	(219)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229)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本质	(229)
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234)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238)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238)
第二节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243)
第三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	(248)
第十三章	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	(251)
第一节	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251)
第二节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58)
第三节	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267)
第十四章	确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74)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	(274)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280)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283)
第四节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286)
第十五章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	(291)
第一节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291)
第二节	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	(293)
第三节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298)
第四节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302)
第十六章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307)
第一节	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307)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	(315)
第三节	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318)
第十七章	推动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构想	(321)
第一节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战略构想的形成与发展	(321)

第二节	“一国两制”构想的成功实践和重大意义	(324)
第十八章	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	(332)
第一节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332)
第二节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338)
第三节	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的新发展	(349)
第十九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	(355)
第一节	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355)
第二节	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356)
第三节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各民族的大团结	(360)
第四节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363)
第二十章	积极推进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	(367)
第一节	军队和国防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367)
第二节	邓小平军队和国防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369)
第三节	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	(372)
第四节	建设现代化的国防	(375)
第二十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378)
第一节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	(378)
第二节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380)
第三节	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使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	(385)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探索

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成为理论界、学术界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弄清马克思主义如何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渠道和历史，以及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不断深化，对于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过程、理论成果以及基本经验，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意义，更加坚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的历史追溯

一、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最早被介绍到中国问题的看法

关于马克思最早被介绍到中国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李贤哲认为，最初是由西方传教士、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这三种人介绍过来的。他们在兜售和鼓吹自己主张的过程中，却先后不自觉地、零星地、甚至是歪曲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内容介绍给了中国人民。不过，这些一鳞半爪式的介绍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社会反响。

他认为，在中国史籍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是英国传教士威廉士于 1887 年在上海创办的一种刊物——《万国公报》。1899 年 2 月该刊物登载过巴黎公社和第一国际日内瓦大会的消息，随后，它又介绍欧美各派社会主义。1899 年 3 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提到了马克思并用了《共产党宣言》的内容，这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报刊上。此后，来华传教士所办刊物上又陆续登载了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后来，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办的《新民丛报》、《大公报》上也相继刊登了一些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译文。1902 年 10 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十八号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一文，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了简要的介绍。然而这些介绍都是作为西方政治学派中的一派加以介绍而已，其目的是借此向清政府施加压力，逼迫清廷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以孙中山为首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同时，也十分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他们用一种赞赏的态度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1896 年孙中山旅居伦敦时，就开始了探讨社会主义理论，并知道了马克思。1905 年初，孙中山访问了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会见了当时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得及书记处书记胡斯曼。在会见中，孙中山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并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和纲领，他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是要避免其种种弊病”，“我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为此，孙中山还请求第二国际书记处接纳他

为“党的成员”。但由于种种原因，孙中山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尽管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还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还是进行了大量的摘译，较系统地进行了介绍。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朱执信、宋教仁等人都曾在《民报》上著文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摘译《共产党宣言》中有关的章节内容。1906年1月，朱执信以笔名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学说，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而从事的一系列革命活动。

关于马克思主义何以能传入中国？学术界认为，其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出现，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力；其二，新文化运动为各种思潮的传入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其三，知识分子探索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爱国心。

二、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这句话形象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一个主要渠道，但这种说法并不能完整地概括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途径。而且，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比较早，并不是到了“十月革命”以后才开始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博士汤涛认为，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除了俄国外，还有日本和西欧，这三条渠道交叉配合，互相补充。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范围才逐步扩大，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思想理论基础。

日本一度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有影响的一条渠道，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都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蔡元培曾在其《社会主义史序》中提到：“西洋的社会主义，二十年前才输入中国。一方面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一方面是留法学生从法国直接输入的”（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第136页，棠棣出版社，1950年）其中尤以留日学生的作用为大。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何以“取径东洋，转道入内”？这里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马克思主义在日本被翻译得较多，为留日的中国学生接触并日益接受；其二，日本的崛起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希望从中找到救国救民之借鉴；其三，日本的劳资矛盾日益尖锐，也使得日本人希望从西方思想中找到解释社会问题的依据。李达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少翻译过来，我们只是从日文上看到一些。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而我们的人又都翻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二）第24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

19世纪末，日本迅速崛起，那么，日本何以崛起？其崛起有无中国可以借鉴之处？这些是当时国人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向日本派出的留学生逐年增多。与此同时，随着日本社会化大生产的快速发展，劳资纠纷和工人失业等问题也开始日趋严重，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广泛传播。20世纪初期，各种宣传社会主义的报刊书籍在日本纷纷涌现，如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等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相继在日本问世，专门从事社会主义研究的团体亦相继成立。这引起了负笈东瀛的中国学子的极大关注。1903年至1907年前后，留日学生掀起了一次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思潮。其时，留日学生竞相将各种宣传社会主义的日文书刊译成中文，同时融合自己的观点，介绍给国内知识界，“社会主义”一词即于此时从日语中引进。虽然社会主义学说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批判，正好适合当时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帝需要，但由

于此时辛亥革命正处于酝酿之中，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在反清革命压过一切的情势下，这次留日学生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热潮很快冷却了。尽管如此，这些有关社会主义思潮及马克思著作的介绍，为近代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发展，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十月革命后，由于中日两国距离较近，人员往来相对便利，更由于长期以来，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译研究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因而在一段时间内，日本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我们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都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他们选读的书籍也大多为日本早期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如河上肇、山川均等人的著述。此外，周恩来在留学日本期间，也特别热心地阅读了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传播者河上肇创办的《社会主义研究》等书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萌芽”。为了能亲自听到河上肇的授课，周恩来甚至还写了入京都帝国大学学习的志愿书。日本学者在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时使用的，诸如“唯物史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类的概念，也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直接引用，并约定俗成，成为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始终通用的概念。

西欧也是中国先进分子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渠道。1917年到1920年期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他们身处西欧这一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亲身体验到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实际状况和工人阶级的贫困生活，也感受了十月革命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因而在思想上进步很快。他们先后组织起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公学世界社、劳动学会等进步组织等进步组织，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学说，探究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蔡和森、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猛读猛译”，直接研读并翻译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列经典著作和许多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较早成为共产主义者和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使者。与此同时，许多西欧学者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大量流入中国，比如，英美学者塞克的《俄国革命史》、俄国学者柯祖基的《马氏资本释义》、以及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等，均对当时中国知识界具有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所说的这句名言是从俄国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对我们党的广泛影响上来说的，反映了20世纪初，尤其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党人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真实情况。十月革命爆发后，继西欧和日本之后，俄国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最主要渠道。上世纪20年代前后，瞿秋白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抱着“为国人开一条新路”的目的，冒险前往苏维埃俄国，并写下《饿乡记程》、《赤都心史》等著名通讯。与此同时，俄国的一些较有影响的著述，如伯伯尔的《社会之社会论》、布哈林的《俄国新经济政策》也被译介到中国。从现有资料看，1923年后，相比较日本和西欧而言，从俄国译介的马克思主义相关著述明显增多。十月革命后，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首先，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得到了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大力推动。当时，我们党早期组织为了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统一建党思想，陆续出版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创办了一些宣传刊物。这从1922年6月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出，报告中指出，所需经费大都来源于“国际协款”。

其次，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在华影响，澄清社会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共产国际

驻华代表马林等还直接向群众宣讲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和建党原则，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再次，为尽快培养中国革命干部，俄共(布)还先后创办了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经由中共党组织吸收并输送大批先进青年赴俄学习先进革命经验，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军事和理论素养。后来，从这些学生中涌现出刘少奇、任弼时和邓小平等一大批杰出的政治运动领袖、军事家、文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三、关于海外华侨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贡献问题

《中共党史研究》副主编任贵祥认为，海外华侨在传播马列主义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长期以来这一点却不为国人所重视和了解。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我国约有华侨六七百万人，有些侨居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侨居在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和一般的独立国家，有些人侨居在马克思、列宁的故乡。这些华侨大多处在侨居国社会的下层，素有爱国、爱乡思想，心灵深处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荡涤，很多人受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洗礼。这样，一些华侨具备了向祖国传播马列主义的条件和思想基础。

首先，旅俄华侨功不可没。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俄国步西方列强的后尘大肆对华侵略扩张、掠夺，大批中国人沦为沙俄的“黄种奴隶”，形成早期的俄国华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十万华工被招募到欧洲战场上充当“炮灰”，其中一部分人成为欧洲(包括俄国)华侨。旅俄华工虽然处境悲惨，但又很幸运——他们是十月革命的目击者、支持者或参加者。大批华工参加了工人赤卫队和苏俄红军，有些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各地响应和参加武装起义。就其实质而言，旅俄华工是俄国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又是一支最先接触到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中国无产阶级队伍。

十月革命胜利后，旅俄华工建立“旅俄华工联合会”，并在全俄各地建立分会，会员迅速发展至约6万人。该会十分关心祖国的命运，主张在中国“走俄国人的道路”，先后创办了《华工》和《旅俄华工大同报》。《华工》为周报，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为宗旨，“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中国，开展宣传活动，并与工农政府携手合作”。《华工》编辑张玉川后来被反革命分子暗杀，据国内有关档案记载，张玉川是“中国鼓吹广义派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首领”。据资料记载，旅俄华人“充当党员”，“到处演说”，“专以传布共产主义于中国为主旨，声势逐渐扩充，已有不可收拾之势”。

不但如此，“旅俄华工联合会”还陆续派人回国宣传十月革命。1919年初，一批华工代表从远东秘密回到我国东北宣传革命。有资料记载：“近日由俄国返国的华工开始在中国居民甚至在军队中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3月初，又有300多名旅华工准备回国开展革命活动。北洋政府获悉后，当即密电全国各地军政首脑“切实防范，弭患无形”。在河北开滦煤矿，也发现了华工传播马列主义的活动。1920年6月15日，开滦煤矿代总矿师戴莫报告称：“我们也可以说从法国、俄国回来大批苦工，带来很激进思想，极近乎布尔什维主义，把这种思想大大散布在矿上的一些坏人中”。“旅俄华工联合会”还积极设法同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取得联系，向他宣传并通过他扩大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

在日本，由于受孙中山革命派人士和留学生的影响，这里华侨思想活跃，创办或参与创办了许多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报刊，其中有的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如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间接地介绍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刊登了华侨革命家廖仲恺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民报》第7、9号)等文章，较

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

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十万华工被招募到欧洲战场，以及 20 世纪 20 年代达到高潮的旅欧勤工俭学运动，在欧洲形成一批有觉悟有思想的华侨。旅欧华工主办或参与创办的《华工杂志》、《旅欧周刊》、《华工旬刊》等刊物，为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人大张旗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载体。

第二节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探索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李大钊为代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最初探索

1.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第一人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生于 1889 年 10 月 29 日。1907 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1913 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1916 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李大钊与近代中国许许多多探求救国真理的志士仁人一样，也曾追求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与自由平等的政治理想，并深受进化论、互助论、人道主义等各种欧美社会思潮的影响。但是这一切都未使他找到中国的出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使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自身不可克服的种种矛盾，认识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侵略战争和工人阶级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劳苦大众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新曙光，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从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原理和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经过不断地求索、鉴别、扬弃和实践，他逐渐摆脱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

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 1918 年相继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1919 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号召人民向俄国学习，关注劳工的命运，成为在中华大地上第一个举起社会主义大旗的人。

李大钊虽然没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的词句和概念，但是他是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第一人。他主张用马克思的学说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而且积极提倡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当陈独秀还沉醉于与文化保守主义的酣战之时，李大钊已经注意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中国文化中的特殊问题了。他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他甚至提出：“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原因时说：“原来

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另外，他对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本质的分析，对劳动问题、妇女问题的新见解，都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尤其可贵的是，当李大钊刚接触马克思主义不久，他就从俄国民粹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得到启发，把注意力由知识分子群体转向工农大众。在1919年发表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李大钊写道：“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利病。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的人。”（《李大钊选集》，第146~147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他在歌颂十月革命是劳工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时说：“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当时，北京大学的一部分学生用实际行动响应了李大钊的号召。1919年5月，由邓中夏、张国焘、罗家伦等人发起了平民教育演讲团，提出“与劳工阶级联合”，至1920年，学生的演讲活动便扩大到了北京附近的农村。同年夏天，上海的青年学生抱定“到农村，和农民一起干农活”的目标聚集在一起。一年以后，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彭湃在广东的农民中间进行组织活动，并最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苏维埃政权。“五四”的这一成果使许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认识到“所有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应该真正抛弃‘高人一等’的旧观念，投身于劳工的世界，完全地与劳工站在一起。”（丁守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第141页）

2.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19年李大钊为《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他亲自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与此同时，广东的杨匏安也发表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杨匏安的这篇文章当时连载十九天，该文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马克思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都有详尽的介绍，它被称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姊妹篇。那时候宣传马克思主要的刊物，还有《每周评论》。《每周评论》最初于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刊，先后由陈独秀、胡适担任主编，主要撰稿者有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高一涵、王光祈、张申府等。五四运动前后，《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互为补充，宣传进步思想，传播革命道理，鞭挞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每周评论》连续五期用全部或大部分篇幅报道和评论五四运动，这对激发人民爱国热情，鼓舞人民革命斗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敌人，起了很大的作用。1919年5月，在马克思诞生101周年的时候，李大钊帮助《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从5月5日到11月11日的六个多月的时间里，专栏共发表了五种论著，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除专栏外，《晨报》副刊还用一定篇幅发表了一些革命领袖（马克思、列宁、李卜克内西等）的传记和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的文章。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各地还出现了一批研究马克思主

义的社团，1920年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翻译了许多马、恩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等，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标志。

3. “问题与主义之争”使得马克思主义吸引了更多的知识分子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越来越广泛地传播，日益引起了当时思想界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在吸引了众多拥护者的同时，也遭到了中国一部分人的质疑甚至否定。这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不宜为中国所用，他们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胡适、张东荪等。他们提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根据是马克思主义是对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总结，它是建立在欧洲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具有本质区别，因此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1919年7月，胡适率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指出：“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应该首先考虑当时中国的社会需要是什么，而不要只空谈好听的“主义”，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作为反应，李大钊随后于8月也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他认为“问题”与“主义”不能截然分开，“研究实际的问题”与“宣传理想的主义”是交互为用、并行不悖的。他说：“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不论高谈什么主义，只要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去作，去努力，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他还说：“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希望。”显然，李大钊与胡适的歧异在于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胡适坚持实验主义的局部改良，而李大钊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吸引了一大批的参与者。为回复李大钊等人的批评，胡适又写下“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胡适声称他并不排斥理想和主义，而只是更注重它们的起源，具体实行方法和实效。他将那种不管实行方法为何，只注重目的，只知道将现成的主义拿来实行的观点称之为一种“不负责任的主义论”。胡适主张用一种“历史的态度”来对待一切学说、主义，既寻出它的产生背景，又注意它的影响效果。主义与问题之争是思想家之间正常的，积极的，探讨式的辩论。论战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了更多的知识分子。1920年，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迅速传播。

4. 各地举行了“五一劳动节”的纪念活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20年“五一劳动节”这天，上海、北京、广州都举行了纪念活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需要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自己的精神武器，而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从工人运动那里找到自己的物质力量。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的同时，认识到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实现其革命理想的阶级基础。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得到迅速传播的同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把唤起中国的工人阶级觉悟作为自己重要的工作内容。1920年5月1日，《新青年》等刊物都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李大钊发表文章，介绍五一节的历史，唤起劳工为自己的解放而进行斗争。陈独秀也为庆祝这个节日发表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一文，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真相。又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作了《劳苦者的觉悟》演说，阐明了“劳动创造世界”、“做工

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的观点。“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与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同时，各种各样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在中国有不同程度地传播，如蒲鲁东、巴枯宁等的无政府主义，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托尔斯坦的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的社会主义等。当时的知识界，把这些“社会主义”都当作新思潮来介绍。所以，孙中山很感叹地说：“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不知哪一种是真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对西方传入的思潮进行分析对比，激烈论战和与中国实践经历进行比较后，坚定地放弃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主张，放弃了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1918年，陈独秀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五四运动以后，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为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毛泽东1918年8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时，在李大钊等帮助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底他从种种主义中选定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后来说：“到了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周恩来1920年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邓中夏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开始接受新思想。1920年3月，参与李大钊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著作。同年，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时一边学习法文，一边翻译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主义各个流派。经过认真的分析、比较，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不移的信仰，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上述人物一样，当时中国有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

一、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20年开始，在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各地陆续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是成立于1920年夏天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其主要成员有陈独秀、陈望道、李达、李汉俊、施存统、沈雁冰等。北京小组成立于1920年10月，主要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何孟雄、张申府等人，李大钊是小组的领导者。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秋建立，主要成员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等人。小组成员不断到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众中活动，并与沪、京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进行联系，为建党工作做出了不少努力。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于1921年初，是陈独秀到广州后，帮助谭平山、陈公博等组织起来的。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帮助下，青年知识分子王尽美、邓恩铭等人于1920年底至1921年初在济南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8月毛泽东与何叔衡等人创办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此外，国外还建立了两个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2月，陈独秀派张申府在法国巴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参加的有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人。日本东京成立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其主要成员是施存统、周佛海，建议教师指导学生制作《共产主义小组简表》，培养学生的学科实践能力。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7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条件；第二，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阶级条件；第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更直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第四，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国际条件。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有组织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同时也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自觉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桥梁。各地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都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上海小组把《新青年》从1920年9月起改为机关刊物，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转载列宁的一些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11月7日，又发起出版了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主编。主要介绍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特别是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列宁著作。月刊还发表一些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纲领、策略的文章，批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公开树起共产主义大旗，与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斗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也积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由李大钊出面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北京小组还创办了《劳动音》周刊，用通俗的文字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还深入北方各地的厂矿，了解情况，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即工会。上海、广州、北京等地的党组织还出版了通俗的刊物《劳动界》《劳动者》和《工人周刊》。这些刊物深受工人欢迎，《劳动界》被工人称为“我们工人的喉舌”，《工人周刊》成为最受北方工人欢迎的刊物。各地共产党还为工人办补习学校、识字班等，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共产党组织的宣传活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三、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提高党的理论素养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但是，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从一九一八年李大钊开始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到一九二一年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满打满算也不过三年的时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较之欧洲要短得多”。再加上党成立后，当时已基本成熟的革命形势要求无产阶级革命家迅速把主要力量投入到革命实践中去，因而无暇进行长时期理论研究和革命经验总结概括工作。这样就使我们党存在先天的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为克服理论不足的弱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加强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增强了党的理论素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我们党早期组织建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一直非常重视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并有组织、有计划地积极译介、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建党前后，各地党的早期组织，都把《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等作为启蒙读物和教科书。延安时